

精英比草根更陶醉于小富即安

↓这个时代不需杰出人才是自欺欺人 燕赵都市报 11月13日 作者 郭之纯

【燕赵都市报一评】

斯人已去，斯音未杳。“我们国家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生前对人才和教育问题的“发问”，近些天来引燃了无数的焦灼。然而，在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道教授看来，这样的焦灼和担忧却似乎有些多余。他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

（《中国青年报》11月12日）

王教授为自己观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当下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就人才和发展的关系，王教授讲得似是因果颠倒了。

中国经济正在遭遇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困扰。如何尽快掌握更多核心技术，使“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以获取产业链上的更多收益，是令企业界备感烦恼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下中国经济之所以主要靠廉价劳动力推动，是因为杰出的创新人才太少。

如果中国能出几个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出几个西门子一样的公司，能造出比波音更好的飞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量肯定就不会再是农民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再付出当下这种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所以说“这个时代也许不需要太多特别杰出的人才”，在笔者看来是自欺欺人。

同样有自欺欺人之嫌的，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决定人才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是环境，而有利的环境一般都是慢慢养成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才能培育出有利人才成长的精神氛围和物质条件。所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应时而生”这种想法，表面看是乐观，实际上很懵懂。

关于人才，王教授还有一个观点亦令人颇难苟同。就“怎样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的问题，王教授认为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可否认，有些人才的能力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是因为单位的小环境差，甚至被淘汰。但

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单位所有”这一形式本身，而在于“单位”本身的机制运行有问题。“单位所有”固然让人才的流动性差了一些，但同时也让人才少了后顾之忧，更可专心自己的研究。两厢衡量，“单位所有”应是利大于弊的——假如“单位”本身没什么问题的话。

【现代快报再评】

本文作者痛驳王义道前常务副校长的意见，我基本赞成，但我想王同志肯定不服。我相信，他讲这番话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并不是什么机关的新闻发言人，没义务说大话，而且已退休，没有再捞什么的空间和动机。不少人就是这样想的，对中国的自我感觉好得很：虽然遇到世界金融危机，廉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减少，但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还在高速增长吗，全世界不是都在指望中国撒钱当“救市主”吗？所以他认为“不要着急”靠

廉价劳动力还可以继续一段好时光。至于要创新，要升级换代，也就是说吧，不必当真，不然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为何仍然达不到教育法规定的比例？为什么有钱办世界最豪华的奥运，却让学校被大雪压塌的事一起又一起地发生？总之，一句话，王教授不过说出了不少官员和精英的心里话而已。

至于说到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王教授讲得更比本文作者有道理，更接近中国实际。美国的“终身教授”之类无非是吸引人才的手段，让你无后顾之忧专心搞研究，但你要走也挡不住。中国的“单位”对人才的吸附能力岂是美国能比的？不要说“单位”了，不同地区的户口上都承载着很大的福利差别！“好单位”与“差单位”，工作条件与薪酬待遇的差距，简直比“欧洲”和“非洲”还大，所以很多人不得不“依附”在“好单位”，哪怕是孩子上学条件好一点。

失职官员的心比雪还寒冷

河北省中南部突降大雪，位于永年县西滩头村的龙凤学校餐厅因不堪大雪重压于11月11日18时30分左右坍塌，多名学生被压。截至11月12日，在该起事故中受伤的3名小学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北方新报 11月13日）

↓天堂里已挤不下夭折于学校的孩子 华商报 11月13日

【华商报一评】

为什么又是学校？为什么又是学生？为什么又是校舍？

当地政府是这样反应的：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县两级官员迅速赶赴现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受伤学生；立即调集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孩子；中小学放假两天，对全县中小学房屋进行全面排查……看看这样的表现，当地政府官员是多么地举一反三、尽职尽责，是多么地把孩子们的教育安全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啊——可他们早干什么去了？

落笔至此，不由自主想到汶川大地震中损失惨重的中小学校舍，甚至不由自主想到新华社对2007年淮河地区洪涝灾害的报道：教育系统成为洪灾重灾区，倒塌校舍数千间，受灾学校2559所。

1981年3月31日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抓紧解决中小学危房倒塌不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好中小学这项人命关天的大事，做到从1981年起不再砸死人”。28年过去了，无数的中小学生在依然不时在校舍的倒塌中夭亡。

答案在哪里？答案在于某些部门对GDP的重视远远超过教育，在于某些部门对经济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生命的尊重，在于不少地方政府对城市化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农村的重视，在于普遍的、严格的官员行政问责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笔者即将搁笔时，又传来河南开封县新宇中学发生餐棚倒塌事故，又有学生不幸身亡！

【现代快报再评】

令人痛心的大雪压塌校舍事件，只能说明两点：一，有些地方的官员，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口头禅，言行相悖，说一套做一套：说“再穷不能穷学校”，做的是“再穷不能穷衙门”；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做的是“再苦不能苦领导”。二，吏治不严，对无良官员姑息养奸。试想，如果一旦有地方出现校舍倒塌等问题，就严查当地领导的责任，把推行的诸如“上访”一票否决移用于学校出现危房，还会有这种事故一再发生吗？县级地方财政确实紧张，难道只有官车和公款吃喝才是必须优先确保的支出吗？

对于这样的事故，不知我们的余秋雨大师会说什么，还会不会“含泪”要家长们顾全大局不喊冤？

就怕人大代表有脾气没底气

↓人大代表有权利方敢闹脾气 中国青年报 11月13日 作者 宋桂芳

【中国青年报一评】

昨天的调研现场气氛热烈，但在提起汽车尾气问题时出现一段插曲：环保局长丁红都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打断市人大代表、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邓成明的发言，邓成明随后离开会场。

（《南方日报》11月12日）

在人大代表闹脾气这件事上，主流的认识是“这只是调研活动中的一个插曲”，而我以为这才是人大制度的主旋律——人大代表出来调研，是代表选民检查和监督政府工作，职能部门只有虚心倾听和耐心答疑的份儿，相关部门对人大代表的态度就是对公民的态度——当然也不是说人大代表就永远正确，但他们表现如何，一方面有法律法规约束，另一方面还有推举他们的群众监督，不用被监督的单位过于操心。既然人大代表要替群众说话，职能部门要为代表心中的疑惑做解释，一旦大家都真正进入角色，“发乎情”时未必都能“止乎礼”——毕竟，人都是情绪动物。

从这个意义上看，发生在广州的几次“会议事件”，抛开是非对错不谈，其实都很真诚，骨子里充满着“角色到位”的制度光彩。比如去年两会期间，广州代表团第三小组审议两院报告，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直言司法系统的问题，遭梁继省人大代表打断，在要求李永忠代表停止发言未果后，梁代表退出会场。

这些事件都曾引发舆论热议，但公众并未觉得这种挑刺或直言有多么不和谐，反而给予当事人更多理解与支持，也为城市民主风气的开化加分不少。某种意义上，这些“插曲”更让公众看到了权利被主张、话语被释放的本色，比举手或鼓掌式表达更令人信服。

真权利方有真脾气。就拿广州的事情来说，我以为为争执双方都是理性而可爱的：如果人大代表不是想说点群众关

心的事情，何必和局长拉下脸，一团和气岂不是更有利于个体利益？如果职能部门不是看重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完全可以表面谦虚内里骄纵，就让你过过瘾又如何？当然，争执是为了达成共识，“不和”是为了“更和”。

权利在民，权利和民众的喜怒哀乐一样也应该有健康而鲜活的情绪。正因为权利是真实的、是可以兑现的，执掌权利的主体才会真情流露，理性之外又洋溢着人本的温情。权利有点脾气，公平才能长点血性，公民社会才更为可期。

【现代快报再评】

广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许是比别的地方的代表委员敢说一点（也可能是媒体敢报一点，即别的地方有这种事但媒体没能报道和“炒

作”），但作者对广州的评价我看是过高了。这样的代表和委员毕竟也是少数。文章不是说了，那个列席的梁代表都不愿听人家发言批评司法系统呢，高代表、邓代表也都只能说有“个性”，即别的代表并没有支持他们效仿他们。所以，说是广州“人民代表有权方敢闹脾气”未免夸大其辞以偏概全。应该说邓代表这样的人是有底气方敢“闹脾气”，人家根本不在乎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虚名，要么让我依法享有代表和常委应有的监督政府的权利，要么我就不当这代表委员；不看官员的脸色行事，我的法学教授照当，法学院院长也不至于就当不成了，当不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人民代表的底气，如果不是来自个人的专业能力而是来自选民授权，那就更好了。

官员为何热衷与常识唱反调

↓教育乱收费真的已“解决”了？ 新京报 11月12日 社论

【新京报一评】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10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国家投入1600多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政策。这样一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项目很少，而且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教育“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

（《人民日报》11月11日）

教育“乱收费”现象真的解决了吗？就在前几日，国家统计局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昂的教育费用已成为有适龄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项沉重的负担，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而在稍早时间，网友们对新任教育部长表示“五大期盼”，其中之一就是“整治教育乱收费”。面对整治教育“乱收费”的强大社会呼声，不知道何以能得出“乱收费已解决”的结论。

如果能想到，有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履行教育投入的责任，切实保障义务教育经费，而且挪用、挤占中央与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如果能想到，有的地方存在严重的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导致择校热

高烧不退，择校费、借读费难以禁止，并以变相的捐赠、赞助名目出现；如果能想到，在实行义务教育全免学杂费之前，我国义务教育曾实施“一费制”，其他收费项目也被禁止，可为何不少地方仍严重存在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如果能想到，在国家有关部门严查乱收费的背景下，为何多年来教育乱收费列行业不正之风

的榜首，那些乱收费地区、学校的责任人，并没有真的被严肃问责——作为教育官员，还会有这样的结论吗？

最近，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针对北京大学日前公布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撰文说：“由这件事反观我们的不少决策，小到一所学校一个单位，大到一个部门一个系统，许多决策的始作俑者

可谓动机高尚，目标伟大，心地也很善良，遗憾的是缺少对中国国情的把脉，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缺少细化，同时，纠错机制也不完善，从这一点说，我们期待更加科学有效制度化层面的东西，期待多一些美妙而好念的经”。

如果不深入调查、不听民众的意见，做“闭门决策”“闭门畅言”，决策也就成了“闭循环”，难以对现状产生作用。这就是过去很长时间内，有些政策一出台就受到质疑，政策没有得到执行，却被认为成果显著的重要原因。媒体前不久所报道的教育八大潜规则的形成，也得益于这样的治标不治本以及虚夸治理效果的管理思维。因此，如果要想“解决”教育乱收费，那必须先“解决”这样的思维做起。

【现代快报再评】

上级机关的官员的判断与实际生活中百姓的感受天差地别，岂独教育行业如此？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普遍得很，所谓“报喜不报忧”“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由来久矣。自古以来，一方面是“蒙骗至上”是“欺君”大罪，另一方面官员“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屡见不鲜，用本文作者的话说，就是信息只在官僚系统里“闭循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由人民监督政府，这个渠道不畅通，动辄就是“诽谤（政府）罪”、“不容”“以个人意见否定政府工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等纸包不住火了才明真相，政府信誉损失、社会损失都太大了。